

## 第六章 結論

綜觀劉過的一生，他伏闕上書、親獻奇策，壯遊國土考察河山，親自參與開禧北伐，時時憂國事，始終堅持主戰立場；並且追步辛棄疾，以騰越飛揚的才情和勁挺的筆力，創作意氣昂揚的愛國詞作，在《龍洲詞》中痛抒黍離麥秀之憂，痛陳治國安邦之論，高唱請纓殺敵的壯歌，感慨壯志難酬的憤懣，並且揭露統治者醉生夢死、苟且偷安。孤憤傷時之情，報國無門之恨，見於行動，溢於言表，其情更熾，其意更切，使人讀之扼腕哽咽，迴腸蕩氣。

劉過逝世二十多年後，南宋文壇上出現江湖派，生當其時的方回在《瀛奎律髓》卷二十中說：「江湖游士，多以星命相卜，挾中朝尺書，奔走闡臺郡縣餬口耳。慶元、嘉定以來，乃有詩人為謁客，龍洲劉過改之之徒，不一其人，石屏亦其一也。」<sup>1</sup> 他把劉過視為江湖派的一員。所謂江湖詩人是活躍於南宋後期的一個獨特的知識份子群，他們通過干謁和結社而活躍在社會生活的舞臺上，體現自己的價值，並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，這就是「江湖遊士」的生活方式。干謁是江湖詩人生活的又一重要內容，干謁的對象是達官、顯貴、名士，目的在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，形式則是獻文、獻詩、獻詞，這與劉過半生淪落的生活型態的確頗為相似，據張世南《游宦紀聞》：「黃尚書由帥蜀，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，過雪堂，行書〈赤壁賦〉於壁間，改之從後題一闕，其詞云：『按轡徐驅……』後黃知為劉所作，厚有餽貺。」或是郭霄鳳的《江湖記聞》中記：「稼軒為買舟於岸，舉萬緡於舟中，曰：『可即行，無如常日輕用也。』」皆見劉過透過干謁獲得生活的經濟來源。但是，劉過和那些江湖派中的「山人」、「名士」並不相同。劉過一生奔走四方，不是為了餬口，也不完全是為了獲取功名利祿，而是希望獲得知己，使他能施展「斬樓蘭」、「整頓乾坤」的抱負，對其抗金的英雄氣概和壯志難酬的憤懣，是不加隱瞞的，如蘇紹叟〈雨中花〉詞題云：「數日前，忽聞劉改之去世，悵惘殆不勝言。因憶劉改之每聚首，愛歌〈雨中花〉，悲壯激烈，令人鼓舞。輒倚此聲，以寓余思。」

---

<sup>1</sup> 方回：《瀛奎律髓》卷二十，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國五十三年月份不詳），頁49。

凡未忘吾改之者，幸為我和之。」<sup>2</sup> 劉過在當時，儼然有「白衣卿相」之尊，愛歌〈雨中花〉的壯懷激烈，展示給讀者的是英雄失路的激憤和苦悶的靈魂。

其次，南宋當時面臨著金的侵略威脅，對於「和」與「戰」這個有關國家民族前途的主要問題，劉過的態度極其鮮明，他力主抗金，收復失地。所以他雖然「十年南北走東西」，但他接觸的著名人物如周必大、韓侂胄、辛棄疾、陸游、陳亮、吳玠、郭倪、岳珂等都是主戰派、不是投降派。對於當時一些著名的投降派，他和他們沒有什麼交往，更沒有阿諛過他們。劉過在〈方竹杖〉詩中說他自己是：

鶴骨風前瘦，龍姿雨後鮮。鋒稜四面峻，節摻一生堅。

荷蓀行隨適，看山依最便。從教方有礙，終不効規圓。<sup>3</sup>

他一生的實踐也證明了他的說法是正確的，特別是在對待「和」、「戰」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更是如此。他和那些不擇手段，醜態百出的江湖派的「山人」、「名士」畢竟是不相同的。清朝紀昀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九九中說劉過是「縱橫之士，志在功名，故不能規言矩行」，顯然是錯誤的。應以《四庫全書》〈龍洲集提要〉：「特以跌宕縱橫，才氣坌溢，要非齷齪者所及，故今猶傳焉集。」之說較為中肯。就如宋朝詩人呂大中在劉過去世三十二年後，在其〈宋詩人劉君墓碑〉中說：「然橫用黃金，雄吞酒海，生雖窮而氣不窮；詩滿天下，身霸騷壇，死雖窮而名不窮。乃知先生之窮異乎常人之窮也。」<sup>4</sup>，對於劉過來說「生雖窮而氣不窮」、「死雖窮而名不窮」，這是極為公正的評價。

身為豪放派的大將，劉過秉其凜然的正氣，愛國詞篇大氣磅礴、筆力雄健，長期放浪江湖，不為世用的際遇，使他的抒情之作每含家國之恨和報國無門之痛，他以愛國詞發出抗戰的呼聲和抒發憂國憂民的胸懷，並抒發對祖國山

<sup>2</sup> 蘇紹叟：〈雨中花〉詞序，見《龍洲詞校箋》附錄二，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9月），頁99。

<sup>3</sup> 〈方竹杖〉，《龍洲集》卷七。

<sup>4</sup> 呂大中：〈宋詩人劉君墓碑〉，《龍洲詞校箋》附錄一，頁95。

河的深摯愛戀和生動多姿的筆致，與後代詞以深刻和多方面的影響。然清代詞家論及劉過詞時，每多批評，如：

稼軒詞之於宋人中自闢門戶，要不可少。有絕佳者，不得以粗、豪二字蔽之，如此種創見，以為新奇，流傳遂成惡習。存一以概其餘。世以蘇辛並稱，辛非蘇類，稼軒之次則後村，龍洲，是其偏裨也。<sup>5</sup>

余閱劉過《龍洲詞集》，而未免粗。此評真不能為改之諱。詞至宋末，多墜惡道，有目人所共知。又竊幸余與升庵，論之若合符也。<sup>6</sup>

蓋升庵素稱博洽，於詞更非門外道黑白。如云：「辛稼軒自非脫落故常者，未易闖其唐奧。劉改之所作〈沁園春〉，雖頗似其豪，而未免於粗。……」此說極愜當。<sup>7</sup>

詞家講琢句而不講養氣，養氣至南宋善矣。白石和永，稼軒豪雅。然稼軒易見，而白石難知。史之於姜，有其合而無其永。劉之於辛，有其豪放而無其雅。至後來之不善學姜、辛者，非懈即粗。<sup>8</sup>

龍洲自是稼軒附庸，然得其豪放，未得其宛轉。<sup>9</sup>

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，其實黃不及秦遠甚。猶高之視史，劉之視辛，

---

<sup>5</sup> 清·程洪撰·胡念貽輯：〈沁園春〉（辛棄疾疊嶂西馳），《詞潔輯評》卷六，收入《詞話叢編》，頁1372。

<sup>6</sup> 清·李調元：〈白日見鬼〉，《雨村詞話》卷二，《詞話叢編》頁1416—1417。

<sup>7</sup> 清·謝章铤：〈詞品大體可觀〉，《賭棋山莊詞話》卷四，《詞話叢編》頁3372。

<sup>8</sup> 清·謝章铤：〈南宋善養氣〉，《賭棋山莊詞話》卷十二，《詞話叢編》頁3470。

<sup>9</sup> 清·馮煦：〈論劉過詞〉，《蒿庵論詞》，《詞話叢編》頁3592—3593。

雖齊名一時，而優劣自不可掩。<sup>10</sup>

對劉過的愛國詞每以「粗」字與之，並視劉過為辛棄疾的附庸，偏裨。而陳廷焯先生在《白雨齋詞話》中更是將劉過批評的一無是處：

詞有表裡俱佳，文質適中者，……詞中之上乘也。有質過於文者……亦詞中之上乘也。有文過於質者……詞中之次乘也。有有文而無質者，劉改之、施浪仙、楊升庵、彭羨門、尤西堂、王漁洋、丁飛濤、毛會侯、……吳穀人等諸人是也。詞中之下乘也。有質亡而並無文者，……並不得謂之詞也。論詞者，本此類推，高下自見。<sup>11</sup>

詩詞原是可觀人品，而亦不盡然。詩中之謝靈運、楊武人，人品皆不足取，而詩品甚高。尤可怪者，陳伯玉掃陳、隋之習，首復古之功，其詩雄深蒼茫中，一歸於純正。就其詩人論人品，應有可以表見者，而諂事武后，騰笑千古。詞中如劉改之之輩，詞本卑鄙，雖負一時重名，然觀其詞，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。……<sup>12</sup>

改之全學稼軒皮毛，不則即為〈沁園春〉等調。淫詞褻語，污穢詞壇。即以艷體論，亦是下品。蓋叫囂淫治，兩失之矣。<sup>13</sup>

板橋論詩，以沉著痛快為第一。論詞取劉、蔣者，亦是此意。然彼所謂沉著痛快者，以奇警為沉著，以豁露為痛快耳。吾所謂沉著痛快者，必先能沉鬱頓挫，而後可以有於沉。病在輕浮，何有於著？病在魯莽滅

<sup>10</sup> 清·彭孫橘：〈黃不及秦〉，《金粟詞話》，《詞話叢編》頁 722。

<sup>11</sup> 陳廷焯：〈論歷代詞〉，《白雨齋詞話》卷八，《詞話叢編》頁 3968 — 3969。

<sup>12</sup> 陳廷焯：〈詩詞與人品〉，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五，《詞話叢編》頁 3894。

<sup>13</sup> 陳廷焯：〈改之全學稼軒皮毛〉，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一，《詞話叢編》頁 3794。

裂，何有於痛與快？<sup>14</sup>

劉改之、蔣竹山，皆學稼軒者。然僅得稼軒糟粕，既不沉鬱，又多支蔓。詞之衰，劉、蔣為之也。板橋論詞云：「少年學秦、柳，中年學蘇、辛，晚年學劉、蔣。」真是盲人道黑白，令我捧腹不禁。<sup>15</sup>

在鄭板橋眼中「奇警豁露」的劉過詞，卻被陳廷焯先生認為是「淫詞褻語」、「魯莽滅裂」的不良作品，而且劉過不但「詞作卑鄙」，連人品也無可效之處，他甚至將詞體衰敗之責歸於劉過，劉過可說簡直連詞壇的一席之地都沒有了。

劉過的詞作是否真的如此卑下不堪？或是僅得「粗」而未見婉轉？詞人滿腹詩書，終身未第，壯志未酬，不少作品深蘊著一種勃鬱不平之氣，寄託身世飄零、家國興亡的感慨，至於那些撫時感事，弔古慨今或借古鑒今的作品，其愛國思想就更加明顯了。劉過以直抒胸臆，明白如話的句子，直接的表達了愛國情感，予人不夠沉鬱之感，但《龍洲詞》中還有一些含蓄婉轉，輕靈要眇的佳作，如被先著譽為「數百年絕作」的〈唐多令〉，讓「天下與禁中皆歌之」的〈賀新郎·贈娼〉，描寫艷情卻洗盡鉛華的〈四字令〉，或沉鬱，或婉麗，都體現了《龍洲詞》多樣化的藝術風格，不應僅以「粗豪」視之。

愛國豪放詞給後人提供的是如何正確對待歷史、民族、國家、人生這樣一些重大的問題，劉過的詞作不僅由於其題旨充分反映了時代精神，而且在藝術上也有極為成功的顯著特色，因此劉熙載《藝概》說：「劉改之之詞，狂逸中自饒俊致，雖沉著不及稼軒，足以自成一家。」<sup>16</sup> 這樣的說法是公允的。《龍洲詞》縱橫跌宕、浩氣盤曲的「狂逸」風格確立了劉過在詞史上「自成一家」的地位，成為豪放詞的後勁，南宋抗戰詞的中堅。就如羅振常先生所言：「雖

---

<sup>14</sup> 陳廷焯：〈板橋論詞取劉、蔣〉，《白雨齋詞話》卷六，《詞話叢編》頁3931。

<sup>15</sup> 陳廷焯：〈詞衰於劉、蔣〉，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一，《詞話叢編》頁3794。

<sup>16</sup> 劉熙載：《藝概》卷四，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58年4月），頁4。

不能方駕蘇、辛，而為之驂乘無愧色矣。」<sup>17</sup>

「國家不幸詩家幸，賦到滄桑句便工。」（清趙翼〈題遺山詩〉），今日重讀劉過之詞，品其詞翰，仍然可以感到這是一個憂世拯民、奮進求成但又無法施展抱負的正直文人。千百年來，文人評價，已有固定模式，即最講「知人論世」；人品、學品、詩品、詞品總是有某種關聯的。在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薰陶下，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的信念成了讀書人心中最基本要遵守的準則。當然許多人達時未必真能兼濟天下，但「獨善其身」則是他們在失意時一致的行動準則。杜甫流落川蜀，衣食不給時猶不忘憂國憂民，是歷來讀書人的典範；而劉過布衣終生，到老仍志於殺敵報國，亦值讚揚！在當時那種朝野上下死氣沉沉，「士大夫諱言恢復」的局面中，劉過始終不渝的堅守著抗戰救國的信念，並為之奔走呼號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，比起那些只知苟且生存的官宦們，不消說要強上好幾倍，就是和那些在位時勤於政事，罷職後就消極悲觀的獨善士大夫相比，更顯出難能可貴之處。劉過一生愛國之情未有略減，報國之意不曾稍減，就如羅振常先生所言：「其忠義磊落之氣，固無殊於東坡、稼軒，天下士夫皆能以龍洲之心為心，幾何不返叔季為唐虞也！」<sup>18</sup> 在那昏暗的時代中，劉過的一份忠貞愛國之意，更顯得異常珍貴。

劉過是愛國的，他雖然常放縱杯酒，狂歌醉飲，其實卻是一個再清醒不過的正直的知識份子。透過《龍洲詞》，他將愛國的情操和民族意識傳遞出來，並在歷史洪流中，不斷的綻放熠熠光芒，影響了後代千千萬萬有為有守的忠義志士，他秉持著一顆「臣心畢竟終憂國」的愛國心，為恢復中原竭盡最大的努力。明人沈魯在〈龍洲先生墓碑記〉中，即指出：「先生之志在於振興國勢、復國恥，挈中原以歸版圖，尊夏攘夷，扶掖人紀，雖以一布衣之微，而有憂天下之志，既不克遂，而寓意於制作者，亦略可見矣。」正因為這個緣故，《龍洲詞》更彰顯出不朽的價值，對一生困頓不遇的他，在歷史的舞臺上，獲得的更是比廟堂令譽更有價值的地位。

---

<sup>17</sup> 羅振常：〈蟬隱廬龍洲詞序〉，《龍洲集校箋》附錄三，頁95。

<sup>18</sup> 同上注。